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新编满族大辞典

ᠨᠢᠪᠢᠨ ᠮᠠᠨᠤ ᠳᠠ ᠴᠢᠳᠠᠨ

主编 李治亭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主编 李治亭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编满族大辞典/李治亭主编.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610-7859-4

I. ①新… II. ①李… III. ①满族—中国—词典
IV. ①K282. 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0407 号

出 版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印 刷 者: 辽宁彩色图文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 185mm×260mm

印 张: 90

插 页: 24

字 数: 202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贾海英 祝恩民 崔利波

封面设计: 韩 实 徐澄玥

责任校对: 李 佳 齐 悦

书 号: ISBN 978-7-5610-7859-4

定 价: 200.00 元

联系电话: 024—86864613

邮购热线: 024—86830665

网 址: <http://www.lnupshop.com>

电子邮件: lnupress@vip.163.com

前言

1990年，以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孙文良教授为主编，组织东北地区部分清史、满学学者编撰的《满族大辞典》，由辽宁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距今已经过去20余年。在此期间，满学、清史研究又取得了长足进展，硕果累累，数以千万计；新史料、新观念、新结论不断涌现。显然，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的《满族大辞典》已无法涵盖其后20余年的满学研究成果与大量信息。而如果缺失这些内容，将使这部辞典的时效性受到极大限制。

进入21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迅猛发展，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改变着人类生活的面貌，如何保持民族传统文化，使之生生不息、不断传承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满洲——满族文化与汉文化融合较深，而且满文化已逐渐融入汉文化之中，高科技将助推满文化进一步淡化。这大概是必然之势，但也并非对此无能为力。因此，编撰一部满族百科知识大辞典不失为一种文化选择。具体来说，将满族史与满文化的种种信息，历史的、现实的种种文化形态储存在一部大辞典之中，有可能将满文化的重要信息恒久地传承下去！

为此，辽宁大学出版社提出新的创意：在《满族大辞典》的基础上再新编一部满族大辞典。这一创意立即获得学术界同仁们的支持。该社遂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重点项目，终获成功。此项目之运作，清史学界尤其满学界无不为之高兴！

历时一年半，数十位专家、学者辛苦备尝，一部《新编满族大辞典》的书稿告成，且即将出版，值得庆贺！2015年恰好是清太宗皇太极给“满洲”命名380周年。此书之出版是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最好纪念，也是对《满族大辞典》出版25周年的实际纪念。为一个民族编一部辞典是20世纪的一个学术创新，是值得纪念的。这一学术创新的首创者为主编孙文良、副主编刘万泉两位先生。惜乎，他们在辞典出版后相继离世。《新编满族大辞典》之编

写与出版，一方面表明我们对两位先生开创的事业之继承，另一方面也表达我们对两位先生的崇敬与深切怀念。

《新编满族大辞典》给我们提供了全面再认识、再思考满族历史与文化的机会，提出了我们对其历史与文化的认识与评价，阐明了我们的“满学观”。这在当前乃至将来都是十分必要的。

16世纪末，在明朝统治下的辽东地区尚维持表面平静时，与其毗邻的建州女真发生了一件并不惹人注目的小事件：努尔哈赤率兵不满百人，遗甲13副，毅然起兵，为其被杀的父祖复仇。当时，无论谁都没有看出来努尔哈赤起兵对未来将意味着什么？

然而，伴随着努尔哈赤胜利脚步的是女真社会的大变动，也使当时的社会结构朝着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就是这一小小事件，始彰显出它的不可估量的巨大历史意义：以起兵为契机，开启了清王朝勃兴的历史进程；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未来的满洲就此开始孕育。同时，这也预示着明的统治将走向衰亡。

正如人们所知，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东海女真以及海西女真大部的同时创制了新文字——老满文，并在后金政权建立前，即1615年，完成了八旗制的创建，用八旗制将原属女真人组织起来。至此，以新文字与八旗新组织为标志，女真初步实现了向满洲的蜕变。皇太极继其后进一步扩大了满洲共同体，改进老满文为新满文。以1635年宣布改民族名称“满洲”为标志，满洲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基本形成。从此，满洲以一个新生的民族登上中国历史大舞台，亦即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新成员。

满洲一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就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朝气蓬勃，勇猛进取。仅仅过了8年，这个新的民族就闯过山海关，一举进入北京，“君临天下”。满洲摇身一变，从一个地方民族变为统治全国的统治民族。

满洲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其先世的历史尤其悠久而遥远。溯源流，其远祖可直接追溯到西周时代的肃慎（又作息慎）。其后，历挹娄、勿吉、靺鞨，直至明代女真，亦即满洲的近世祖先。女真人大有作为，建大金国，统

一整个东北，再进黄河之滨，与宋平分天下，得江山半壁，有国120年！400余年后，女真人再度复兴，转化为满洲，且一统天下，取得远比先祖更为光辉的成就。一个少数民族，两度统治中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堪称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满洲作为有清一代的统治民族，主导着中国社会近300年历史的发展。她打破千百年来沿袭的“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确立并实践了“中外一体”的新“大一统”的民族观；她突破传统的“中国”局限，重新给“中国”加以定位。康熙三十年（1691）废长城，撤除内外界限，把“中国”扩展到“三北”地区，将秦始皇创设的郡县制推行到各边疆地区：东北分设三将军、内外蒙古行盟旗制；在西北也行将军制、盟旗、伯克及州县等制；在西藏设驻藏大臣；在西南变革土司制，改土归流。一国多制，一地多制，真正建立起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的国家，实现了至近代千百年来制度与管理体制的第一次大突破，以乾隆二十五年（1760）之极盛为标志，疆域达1300万平方公里。满洲开创的“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一座丰碑；满洲把中国传统文化推上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高峰，大放光彩，是一个灿烂辉煌的文化时代！

满洲创建的“大清王朝”享国268年，其历时之久、建树之多、政权规模之宏大，以及疆域之广、人口之巨，实集历代之大成，是继汉唐之后一代最重要的封建王朝。

要而言之，满洲改变和发展近代中国，文“化”中国，为近代中国定型，又是清以前任何一代王朝所不可比拟的。可以不无夸大地说，满洲堪称伟大的民族，当之无愧！如果没有满洲主导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就没有当今中国的历史定位，就没有今日中国辽阔的疆域，亦不可能定型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新格局。无须深辩，倘若中国继续由明朝来统治，或者换成李自成，或者是张献忠当皇帝，中国将如何？历史固然不能假设，但与假设不同的是，明王朝、李自成、张献忠等都是一度与清并立共存的政治实体，他们都有一统天下或夺取全国政权的实际可能。因此，我们有充分根据作出判断：“华夷之辨”的观念不会变，无论谁当政，必不废长城，难成“天下一家”。尤其值得忧虑的是，当清军入关之时，凶恶的沙俄已入侵到中国黑龙江沿岸，正向东北腹地深入。明历来视此广大地域为其“羁縻之地”，或称“化外之地”，从不

派官派兵驻防，其结果只能是任由沙俄侵占。后来，沙俄继续向我国北部、西北扩张。有明 200 多年，即使最强盛时亦未将此广大地域收入版图，仅维持时断时续的短期朝贡关系而已。明朝如此，比之文化素养更为低下的李、张两政权，还能有何作为呢？事实已证明，只有清朝当国，才有效地挡住了沙俄对我国“三北”的野蛮扩张，保住并扩大了中国疆土。满洲守望中国这个大家园达 260 多年，始有今日中国之规模。毋庸讳言，满洲主导下的清朝也丢失了一些领土，其主客观原因早为人们所熟知，不必重复。

以上所举，远非满洲业绩的全部，亦非对满洲的全面评价，仅列其大端，以见满洲的本质面貌。

长期以来，对满洲认识存在很大的误解，学术界并未给予准确而公允的评价，即未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而是习惯把满洲与清朝合为“满清”，不间断地反复批判。满洲的这一境遇，是由辛亥革命开其端，一则反专制，二则“排满”，将满洲“妖魔化”，遂使满洲在清前中期所创业绩化为乌有，曾有过的辉煌，也变得暗淡无光！满洲随着清朝的逊国，遂失其统治民族的统治地位，其社会地位也是一落千丈。

大约从《清史稿》编纂、肖一山著《清代通史》之后，满洲几乎无人问津。主要是学术界，极少有人研究满洲历史与文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满洲足足被冷落了 60 余年。当然，也不是说一个研究者也没有，而是研究者寥寥，屈指可数，不过如孟森、郑天挺、王锺翰、商鸿逵等。即使如清史，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也只有很少人在研究。

谁会想到，改革开放竟然把清史、满族史研究推上了显学地位，迄今已历 30 余年，两史之研究已成常态，年年推出大批论著成果。据统计，仅有关清史通史的专著就已出 20 余种，满族通史及满族专题史成果也不下几十种。其中，《满族大辞典》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学术大发展的产物。但是，虽然取得的有关满学的成果多多，但基本上还停留在陈述历史与文化现象的研究上，并未论证满洲的历史地位，特别是清朝到底做了哪些事？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发挥了什么主导作用？显而易见，满学研究成果虽多，却未深入，尚未取得本质性的认识。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声音，即排斥满洲。如果这种声音或观点出自当年辛亥革命党人之口本不足怪，恰恰相反，这种声音或观点出现在清亡近百年

后，即21世纪初。此情此景，足见传统旧观念、旧思想是何等的顽固！此类观点虽然并不占据学术界的主流，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种种说法不能不干扰甚至影响人们对满洲、对清朝的正确评说。

鉴于学术界之现状以及社会上还存在着对满洲历史与文化认识之缺失，编一部新的满族大辞典就显得十分必要。一则是对近30年来满学研究进行一次总结，有助于推进满学研究；二则是满洲历史与文化内容极为丰富，为了保护好这笔丰厚的民族特色浓郁的文化遗产，将其尽量收进大辞典，可以使其不致散失，更避免失传。应当指出，满洲历史与文化中存在丰富的人文思想资源，尤其是它在清代当国近300年，具有其他少数民族无法得到的治理与管理国家的经验或教训，可为当代提供借鉴。本次所编辞典，对此将用力挖掘，予以总结，以突出其现实的应用价值。

总之，我们新编的这部满族大辞典，其目的性更明确，思路更为开阔，认识也更深化，方法也更新颖。可以说，《新编满族大辞典》与《满族大辞典》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体现了它自身的新特点。

二

学术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不论研究什么问题，必须要确定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使之成为研究过程中处理各类矛盾的准则。经验证明，如果缺乏正确思想的指引，必将使研究陷入歧途！编写一部融会各类知识的满族大辞典是一件十分繁难的事，加之之前已有一部满族辞典，如何超越它，又是难中之难。因此，我们确立了指导思想的“三原则”：

第一，坚持正确的民族史观。既不站在满洲立场上，也不站在汉民族立场上，而是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立场上，平等地对待满族、汉族及其他民族，公正地评价满洲。前已指出，国内学术界还存在大汉族主义或“华夏中心主义”的思想倾向，视满洲为“外来”民族、“异民族”；把满洲进入中原斥为“侵略者”；清军进关本来是一场“统一战争”，却被指为“民族征服”，即满洲对汉民族的“征服”。类似的说法不胜枚举，无非是想把满洲否定掉。本辞典坚决摒弃旧观念，拒绝一切荒谬的理论，用新观念、新思维来看待满洲的历史与文化，给满洲以正确的历史定位。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功过分明，是非澄清。本辞典对满洲的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人物，无论正确与否，既不夸大，也不有意掩饰，更不抹煞，力争做到实事实写，秉笔直书。例如，清入主北京后，在京畿地区圈占土地，分拨给满洲王公贵族。这本来是局部问题，也被夸大成全局问题。圈地原定圈占明朝贵戚因战乱而荒弃的土地，后来被扩大化了，致使当地农民的土地也被强行圈占。这被斥为清初一大“虐政”，同样是夸大了。类似的问题还有。本辞典如实写来，见仁见智，读者对此自有评断。

第三，坚持开辟新思路，不断进行学术创新。创新是学术的生命，没有创新也就没有学术。创新包含三方面内涵：

一是新发现、新创造。本辞典力求从各种史料中发现满洲历史与文化的新信息，并据此信息去创造一个个新辞目。这正是创新的意思。简言之，我们要从一条史料、一段话、一个观点、一个想法、一项政策、一次实践、一个说法等去发现其中的精华，进行科学概括，从而创造出一个个新辞目。这正是学术创新的意思。下面试举几例：

“从龙入关”是清官书中出现的一个辞汇，是说满洲、蒙古及汉军八旗跟随世祖皇帝进关，迁离东北地区，在中原定居下来。

“满蒙汉一体”是皇太极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并把它作为一项国策加以贯彻实行，因而加强了这三大民族的密切关系，遂使国势逐渐强盛。

乾隆中期，国家达到鼎盛，经济繁荣，社会长治久安。高宗对现状很满足，遂提出“持盈保泰”的主张，欲维持现状，因而也就无须再创新发展了。

至嘉庆时，国势衰落，吏治日坏。仁宗总结官场之弊，其中包括满洲人怠惰，武备松懈，斥之为“因循怠玩”，虽然击中要害，却拿不出解决办法。

虽然类似的事例俯拾皆是，但也要严格标准，认真筛选，将那些含义明确、真正能反映满洲历史文化的语辑入辞典。

一般来说，辞典所收辞目皆来源于满洲——满族中固有的语汇、术语或约定俗成的惯用语。实际上，满洲还有好多词汇未被发现，上述所列仅是几个例证，只要认真查阅史料，深入挖掘，从中提炼出新的语汇，既可以丰富我们对满洲——满族历史文化的认识，亦可以更好地对其历史文化进行科学总结，对于当代实具重大的认识价值。此次“新编”，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发现新词汇，发现得越多，创新就越多。这正是“新编”的第一要义。

二是纠正传统旧说，提出并确认新论断。

关于努尔哈赤之死历来有“炮伤致死”与“病死”两说。我们不取前一说，断为因病致死。

清太宗皇太极是夺位还是为众兄弟子侄拥戴而合法即位？应是后者，不取夺位之说。太宗之死，清官书载，无疾而终。

从辛亥革命到民国初，为反清、“排满”之需要，编出很多离奇的故事，用以贬损满洲。例如，顺治出家、雍正死于侠客的“血滴子”等，这样的事例的确不少。还有，对一个人的评价也有种种，虽然已成“定论”，但发现不合理、不正确者，坚决予以纠正。

三是不循旧例旧规，创新体例，彰显学术创新，否则本辞典就失去了“新编”之意。具体内容留待后面详说。

无疑，学术创新如同一条主线，贯彻始终，体现在本辞典的方方面面。创新无止境，疏漏亦难免。尽管我们已经作出了诸多努力，却未必尽如人意。

众所周知，满洲从其形成到建立国家政权，直至入主中原，“君临天下”近300年，其历史文化无不与明史、清史交织在一起，与汉、蒙、藏、回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相融合。为此，《新编满族大辞典》以满洲——满族的自身历史及一切实践活动为核心内容。这样，一个重要而繁难的问题摆在面前，即如何从上述交织、融合在一起的状态中，把满洲——满族自身的、固有的内容剥离出来，独立成为一个历史文化系列。

我们依据编纂的指导原则，正确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第一，满洲与清朝的关系。清朝是以满洲为主导，联合汉、蒙等多民族共同创建的一代王朝。故满洲与清既相联系，又相互区别：清朝所有未必都是满洲的（因为还包含汉族及其他民族），但满洲的一定是清朝的。因此，选入辞典的内容主要体现在辞目上，重在两者的区别。清朝作为国家政权，其所作所为皆属国家行为，不能都说成是满洲的。又如，清承明制的部分亦不属满洲，只有把其中属于满洲的内容剥离出来，即满洲人所创造的历史文化才属于满洲所固有的。例如，《满族大辞典》中有“大计”、“大考”、“大选”等辞目。这些内容本为汉人之制，前代王朝也有过，故而收此内容不宜。而诸如“蒙古衙门”、“议政王大臣会议”等，为满洲人所创，应归入满洲。

第二，满洲与汉、与蒙古等诸民族的关系。清朝自皇太极始实行满、蒙、

汉为“一体”的政策，以致文化相互认同，互容互吸收，已形同一体。而本辞典专为满洲——满族而作，故不能掺入其他民族的内容。因此，哪些是属于汉、蒙等其他民族的，对此也要分清。一句话，就是不能与其他民族混为一谈。

第三，满洲文化与吸收汉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我们强调，首先要收录满洲原生态的文化及自身的历史内容。而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其原有文化必然发生变化，有的保留，有的废弃，有的部分改变。无论变与不变，或者改变多少，都是属于满洲的组成部分。关键是，满洲吸收了汉文化，成为它的文化内容，即为满洲人所应用。这些理应看作是满洲文化的一部分，自应收入本辞典。例如，满洲入关后接受了汉文化教育，学会了赋诗作文，有的甚至成为一代著名诗人、作家等。满洲人长久地生活在汉人环境之中，被满洲人吸收的汉文化无处不在。对于凡被满洲人所吸收，又为其所用的，皆入录本辞典。

第四，当代满族与历史上满洲之关系。满洲与满族系为一个民族，如前已指出，早在后金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给本族定族名“满洲”，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将其改为“满族”。换言之，这是两个不同阶段的不同族称。这就需要把处于不同阶段的两种历史文化相区别。例如，满洲“堂子祭”的习俗到改满族后已被废弃，故此习俗属于满洲而与今满族无涉。一句话，不同阶段自有不同的文化习俗，不能混淆。至于满洲原有的习俗或其他文化形态仍被当今满族沿用，两者兼而有之，须说清源流，便无疑问。

第五，《新编满族大辞典》与《满族大辞典》的关系。两者是继承关系。就是说，原辞典合理的辞目可以保留下来，新辞典照录不误。但其释文不宜照搬，应予重新制作。尤其是原释文表述不当，或有错误，必须予以纠正。一句话，要慎重对待。原辞典中列辞条不当或误收的，一律弃而不用。例如，原辞典把汉军及蒙古八旗统统认定为是满洲的而入录。本辞典认为，蒙古、汉军八旗不属于满洲，不能与满洲混同，故不予收录。总的原则，对原辞典须严格筛选，在认真甄别后而决定取舍。原辞典这部分内容只约占本辞典的三分之一左右，主体内容还是新编入的新内容。例如，原辞典有关满洲的军事实践活动主要是清建国后与明之战争，仅列四五个条目，而新辞典列了近百个辞目。又如，入录的满洲——满族人物，原辞典不足千人，而新辞典增

为 3000 余人。由于增加了许多内容，故而辞条更充实而丰富。这体现了本辞典的“新编”之意。

我们所列的上述五对关系是在选辞目与撰写过程中严格遵循的原则，具有可操作性。只有坚持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才能保证满洲历史与文化的特色，才称得上是一部纯正的满族大辞典。

三

著名清史大家王鍾翰先生生前应邀为《满族大辞典》作“序”。他在序中写道，该辞典之“特色是：一不求全”；“二不求新”；“三不猎奇”。先生在阐述这三个“特色”时完全肯定该辞典既“全”又“新”，还不“猎奇”，系指不“标新立异”，不“辗转贩卖”。

那么，《新编满族大辞典》有何特色呢？

如果与《满族大辞典》相比，本辞典的特色也是很鲜明的。

先谈“大”，指本辞典的信息容量。原辞典共 6000 余个辞目，而本辞典共收录 9500 余个辞目。若删除原辞典中收录不当的辞目，本辞典则是它的倍数还多。如以单项计，原辞典收录不足千人，而本辞典则收 3000 余人物，是其 3 倍多。以字数论，原辞典 130 万字，扣除目录 20 余万字，正文为 110 万字。本辞典正文 170 余万字，加上目录 30 余万字，总计为 200 余万字，比原辞典增加 70 多万字，增幅为其半。可见本辞典的信息量之大。

再说“全”，指包含满洲——满族的全部历史与文化信息。应当承认，绝对“全”乃至一条不漏是不可能做到的，全与不全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其基本方面或主要方面无遗漏也就做到了“全”。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满族大辞典》时，囿于满族史研究水平及认识的局限，所收辞目内容也只是基本上做到了“全”。但过了 20 多年，至当代，人们对满洲史的认识已大大深入，研究成果成千累万，如收录辞目仍限于原辞典的范围就完全失去了“新编”的意义。因此，我们一方面大力挖掘满洲——满族中新的语汇；另一方面充分吸收当代满学研究的一切成果，使之成为近 30 年来满学研究的集大成者。此即本辞典之“全”的含义。

三说“新”。前已阐明本辞典的学术创新，而此谓之“新”，是指大量新

增添的辞目。除合理吸收原辞典中的部分辞目外,其他大多是新增的辞目。自然,其内容也为前所未有的。这就使本辞典的面目得以焕然一新。说“新”也包括创新的意思。如前所述,将所有不属于满洲(满族)的内容全部删除,从而使本辞典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满洲——满族的大辞典。

四说“用”,即实用性强,这也是本辞典的编写宗旨之一。“新编”不只给专业工作者的研究提供了一部得力的工具书,也给广大的读者提供了一部了解满洲——满族历史文化的百科知识全书。同时,它还是清史、满族史专业学者的参考用书。一句话,就是“新编”是否具有多功能作用,是否具有实用与应用价值,这取决于“新编”的内容是否真正有用,是否能引起人们阅读的兴趣。我们在此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使“新编”达到真正实用的目的。

所谓“特色”,从文化的意义上界定,就是个性。具有与同类内容相同却又不相同的特点,谓之“特色”。

以上所列“四说”,意在阐述本辞典个性化的表现。编写任何一部书,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亦即没有个性,无论怎么说都不是成功之作。我们为此作出了多方努力,力争将“新编”打造成最具学术个性的辞书。

写到这里,也该阐述一下“新编”的具体内容。前已提出编纂体例问题,留待此处,一并解读。

《满族大辞典》全书的内容分作11个门类,反映了那个时代对满族的认识。至今日,本辞典重新审视,给满洲——满族的历史与文化加以重新定位,可删可改可增,共分为14个类别(卷),列举如下:

第一卷,满洲源流;第二卷,满洲姓氏;第三卷,语言文字;第四卷,满洲人物;第五卷,生活习俗;第六卷,宗教信仰;第七卷,八旗满洲;第八卷,军事活动;第九卷,文化教育;第十卷,满洲谱牒;第十一卷,文学艺术;第十二卷,典籍档案;第十三卷,遗存遗物;第十四卷,当代满族。

在上述14个类别中,八旗满洲、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满洲谱牒、遗存遗物、当代满族等皆为满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不可或缺,是本辞典新设门类。原辞典所设之“地理”、“政治”、“经济”等类别是各个民族或社会通用的词语,无法反映满洲历史文化的个性,故弃而不用。例如,“服饰”只是满洲衣着方面的一个内容,不足以单列为一个门类,本辞典将

其归入“生活习俗”类。还有,“语言文化”两者的内涵不同,不宜合为一类。故本辞典将两者分开,分别列为“语言文字”与“文化教育”两大类别。

在此特别强调的是,应将满洲与满族有所区别。前已指出,满洲是有清一代至民国时期通用的族称,而满族则是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更改的族名,至今不过60余年。今之学者不分古今,通称“满族”。毕竟满洲与满族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个时段,其历史与文化差异悬殊,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若论及古、近代必称“满洲”,而至当代理应称“满族”。本辞典打破学术界这一习惯,将满洲与满族分开,特设“当代满族”为一门类,用以反映新中国成立至今这一时段的满族历史文化发展的新篇章。如将满洲与满族混而为一,其辞目与释文混排,将造成一处不得不写满洲,而另一处又不得不写满族的状况,如此重复出现,难免混乱。一句话,本辞典正本清源,再现了满洲与满族不同时期的历史原貌。

以上所列14个类别即构成本辞典的全部内容。如何把这些门类合理而有机地“组装”在一起?这就是体例。编辞书的体例比之其他学术著作丛书或多卷本较为简单。通常的做法,由目录、辞目、释文三个板块组成。至于目录,或按笔画或以拼音等方式排列,仅此而已。著作则复杂得多,如分编、卷、章、节、目等。辞书无此设计。

我们想把这种体例“创新”一下,打破惯例,不采取那种单一按笔画排序的做法。上文已列出14个门类,拟以一个门类为一卷,成14卷,按类别性质,又照顾到历史发展的先后,合理排出卷次。这样排序的好处是:每个门类的内容一目了然,更利于总体把握,内容是否缺失也容易出现。还有一大好处是便于查找辞目,只要找到类别,便可查到相应的辞目,读者利用,可称便当。目录排列,按卷自成一个系统,与他卷不混。全书后另附“辞目笔画索引”,以备检索查阅。

这样的体例虽无复杂之处,但比之一般辞书通常的做法确已革新。同时,采用著作中的某些体例做法应用于辞书之中也是一个尝试。

编好一部辞典殊非易事。前已说明,其难在于入编的内容要全,不稍有遗漏;又难在选辞目要准确无误,还难在文字要求严格规范,即释文要精确、精练,与论著的文字风格及表述方法完全不同。有此“三难”,可以想见,为

一个少数民族——满族编一部包罗万象的辞典更有大难处，集中到一点，就是对满洲——满族历史文化的搜罗与解释未必会尽如人意。事实上，有关满洲——满族的所有方面的内容肯定会有遗漏，且有的辞目不当，一些释文尚不够精练、准确。特别是满洲与清朝连在一起，又与汉民族及其他民族交织在一起，将满洲从中剥离不净，分不清哪些是满洲的，从而必然影响所选辞目与释文的表述。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这部巨著，时间显得尤其不足。没有更多的时间细细打磨，以致本辞典粗疏之处甚或失误亦是意料之中。尽管参与编写的学者们作出了很大努力，仍不能保证万无一失。读者们在使用这部辞典时，不论发现什么问题，请予一一指明，以备将来进一步修正更改，以使本辞典臻于完善。

李治亭

2014年10月

于北京神州数码大厦

凡 例

一、本辞典为综合性满族辞典，凡收入的辞目一律以满洲（满族）为标准，非满洲（满族）的一律不收。

二、本辞典人物辞目收录的截止时间，原则上定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已故满族人物。

三、本辞典分满洲源流、满洲姓氏、语言文字、满洲人物、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八旗满洲、军事活动、文化教育、满洲谱牒、文学艺术、典籍档案、遗存遗物、当代满族等，共 14 卷。

四、辞目中，凡作品、著作均不加书名号。

五、本辞典的分卷目录，辞目均按首字笔画排列，笔画少的在前，笔画多的在后；相同笔画的则按笔顺排列。笔顺按横（一）、竖（丨）、撇（丿）、点（丶）、折（乚）顺序排列，并适当兼顾辞目集中分类（不以辞目字数多少排序）。本辞典书后附“辞目笔画索引”，以备检索查阅。

六、本辞典对于一词多义的辞目分别列①②③……予以解释；对于同一个释文的不同辞目则以一个辞目解释为主，同时列出参见条目。

七、罕见的满语词汇加注罗马拼音，常见的或满汉结合词汇不备注。

八、对于人物的旗籍一般省去“满洲”二字，只写××旗。1952 年划定民族之前的满族人一般称作“满洲”。

九、历史人物，凡说明为“清宗室”或“觉罗”者均不再标注姓氏；人物的生卒年一律括注公元纪年；有疑问的加注问号（？）或注明大约何时人，不能确定者加“约”字。

十、释文中 1911 年以前的纪年一律采用皇帝年号纪年，清朝之后采用公元纪年。每个释文中同一年号在首次出现时均括注公元纪年，后面再次出现则不加括注，亦不加年号，直接写××年。

十一、每个辞目释文后均在括号内注明作者。凡是采用 1990 年版《满族大辞典》的辞目，释文后均在括号内加“※”号，改写 1990 年版《满族大辞典》的辞目释文则在括号内加注改写者姓名和“※”号，如“（李理 ※）”。

总 目

前 言	李治亭 (1)
凡 例	(1)
目 录	(1~129)
正 文	(1~1178)
辞目笔画索引	(1179~1291)
后 记	(1292)